

編者的話

一个人不經過过去的辛酸痛苦，就不知道珍惜今天的幸福，不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就不知道一切胜利来得不容易。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不少的阶级兄弟、同志都有一段辛酸痛苦的历史，这些痛苦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对比现在，它是最生动最实际的活教材。因此，我们特集了八篇家史编印成册，以供广大读者阅读。这些材料，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社会。它用许多具体事实启发我们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从而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编辑出版这类读物，还是一项新的工作，希望读者能够把你们对这本书的意见和今后要求告诉我们。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目 录

- 我家五十年.....申永題 1
- 血海深仇永难忘.....张敦昌 18
- 从苦难走向新生.....26
- 記青島大港碼頭工人楊华云的悲慘遭遇
- 俺家的血泪史.....閻季华 36
- 大年夜.....赵景江 42
- 忆苦思甜.....李本盛 48
- 永不忘本.....53
- 記解放軍空軍某部共產黨員王文江同志
- 四十年牛馬十年人.....李凤英 64

我家五十年

中共青島港務局第一裝卸隊第二支部書記 申永題

我今年五十二歲，舊社會，我在油煎火煉中熬過了將近四十年。這四十年，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罪，我可都嘗受過，我永生不能忘記，也不叫我的後代忘記！

家破人亡

我是日照縣虎山鋪人。五十年前，祖父、祖母就被地主折磨死了。父親弟兄五個，繼承了一畝山荒的祖產，沒地種，父親和叔父給地主扛長活，母親和嬸嬸也按時給地主家推磨、烙煎餅。這樣辛勤的勞動，一年到頭還是不得溫飽。

我六歲那年，家鄉一連八個多月沒下場透地雨，庄稼沒種上，滿坡光禿禿的。狠心的地主見秋里得不到收成，就把父親和叔父趕出來。這年大旱，大路上逃荒的人牽綫不斷，真是要飯也找不上門。大爺、四叔、二叔四散逃了荒，三叔孩子多，沒走動，在家吃屋簷草，一家六口全毒死了。最後，父親看在家是等死，出門也許能尋條活路，用一對筐子挑着我和三姐，母親領着大姐和二姐，背鄉離井也逃了荒。

离家时，天已变坏了，西北风越刮越冷，姐姐他们穿着破单裤单褂，我光着腚，赤着脚，穿了一件破夹袄。身上冷肚里饿，一天转上两个庄，天就黑了。这样一直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诸城，这时天已下了大雪。

一天晚上，全家奔到一座关帝庙里。这庙没窗没门，风卷着雪硬往里刮，我冻得直哭，母亲就把我抱在怀里，坐在一个背风的墙角下，姐姐也都偎依在母亲身旁。半夜里，北风越刮越冷，大姐冻得哭不成声，战抖抖地叫：“娘，冷……。”母亲想把孩子都搂在怀里，可又搂不过来，她就把我递给父亲，又抱起大姐。她含着眼泪哄大姐：“孩子，抖抖精神，等到天明，要口饭吃上就暖和了。”说着说着，只听大姐哼了一声，再没动静了。大姐比我大六岁，自小没吃顿饱饭，这回又饿着肚子冻死了，怎叫父母不伤心，全家一直哭到天亮。

天亮后，父亲把大姐埋葬了，对母亲说：“孩子跟咱逃不了命，得想法给他们找条活路。”可是，那时家家少吃缺穿，谁能顾得谁？父亲还有个拗脾气，饿死也不往财主家送。结果母亲找了好几户穷人家，哀求人家把俺们留下，咋说人家也不收。后来父亲咬了咬牙说：“走！死就死在一堆。”全家挣扎着走了两个多月，好在逃到了青岛。

青岛，那时掌握在日本鬼子手里，那有穷人立足之地。日本鬼子见来青岛逃荒的穷人多了，就借口预防传染病，维持社会治安，到处抓要饭的，抓闲人。叫他们抓去的，有的活活烧死，有的打了“地界”（送出青岛）。

这时全家好象在刀刃上过日子，来青岛后，分文没有，

賃不起房子，父亲在一座貧民院旁边借着一个大灣崖，挖了个洞，全家就住在里面。父亲找不着活干，母亲就領着我和姐姐沿門要飯，轉垃圾箱，拣烂菜叶。这样的日子，也过不安穩，整天提心吊胆，躲躲閃閃，生怕叫日本鬼子抓了去。

躲了今天躲明天，大祸終于沒逃脫。一天早上，父亲爬起来，餓得腿都拉不动，母亲攆他出門躲躲，他恼恨地說：“怎么还不是死，我豁上这条命啦！”母亲知道父亲又上了脾气，就哭起来。这时邻居的大娘、孀子都来劝說：“申大哥，你是家里的頂梁柱子，可不能豁上！”父亲被說得心神不定，迟疑了一会，他刚要走，只听嗒嗒的皮靴声，接着一个日本兵带着两个伪警察堵住了門。那伪警察見父亲要走，喝道：

“站住，你为啥不出去干活！”

“先生，我想干活找不着。”

“好，想干活，跟我走。”

“先生，你行行好，可怜我一家大小，咱都是中国人！”

“混蛋！你煽动破坏，你不知道中国日本是一家嗎！”

这时，站在旁边的日本兵，一看伪警察发了火，順手举起馬刀，照着父亲的胸膛，捅了两捅，戳了两个窟窿，鮮血直淌，接着招呼伪警察把父亲架走了。

父亲被抓后，連过了三堂，打得皮开肉綻。父亲秉性刚直，无罪不肯認罪。有一次在堂上他反冲着法警問：“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莫非沒有活干，在家挨餓就是罪！”法警听了把眼一瞪，喝道：“你敢反抗，来人哪！”接着出来两个伪警察，



把父亲架出去，反绑着手，吊在杆子上，一顿皮鞭，把父亲打昏了。打昏后，他们用凉水喷醒，又打了个昏。就这样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受着惨无人道的毒刑。

在父亲被抓去不几天的一个早晨，母亲坐在门前，思念父亲，哭哭啼啼，不料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伪警察又闯进来，喝道：

“你的几个人？”

“四……口……人。”母亲吓得话不成句。

“在哪里？”

鬼子一吼，二姐吓得从被窝里爬出来，搂着母亲。日本鬼子一看二姐脸肿了，冷笑着说：“小孩病啦，鬼的一样！”

“皇軍，她沒有病，餓的，餓的！”

“你的撒謊，帶走！”

接着两个伪警察拖着二姐就走。二姐哭不成声，母亲不顧一切，赶上去拉住二姐的胳膊，二姐抱住母亲的腿死也不放。日本兵一看发了怒，上去揪着母亲的头发摔开了，回过头来踢了几脚，举起带鞘馬刀，照母亲沒头沒脸地砍起来，母亲被砍昏了。

这时，我哭着向鬼子扑去，叫邻居一个大娘拉住了。等鬼子走后，邻居的大娘、孀子才敢靠前，把血淋淋的母亲抬回家来。我和三姐守着母亲痛哭。这时一个邻居的小孩忽然跑进来报信：“大媽媽，二姑叫日本鬼子烧了。”刚甦醒过来的母亲一听，又昏过去了。

掙扎求生

二姐死后不久，父亲拄着拐棍，拖着瘸腿，从“界外”逃回家来。他看在这个洞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就把家搬到附近山林的一个炮洞子里。在这里，父亲每天出去找着打“卯子工”（临时工），母亲就領着我和三姐要飯，这样又掙扎着熬过了六年。

到我十四岁时，父亲为着讓孩子吃頓飽飯，求亲告友，把我送到一家理发店去学徒。当时，我高兴地想，这回可好了，学上点手艺能帮父亲养家了。离家那天，母亲把洗补好的衣裳給我穿上，含着眼泪嘱咐說：“孩子，去了要好好学，听人家的話，守人家的規矩。”我牢牢地記住了母亲的話。

那时学徒，只管吃，不管穿，进门就立下保状，学徒三年，敬师一年，半途辍学，饭费退回。除此，还有些不近人情的店规。进店头一天，掌柜的就把我叫到跟前，厉声厉色地说：“学徒要懂学徒的规矩，这屋里没有你的座位，屋里有人不能坐下。”

这条店规，听听平常，其实很厉害。进店头三天我都是贴着墙站着，师傅喊要水，我快去倒水，师傅要手巾把，我快递上。我从天明一直站到天黑，站得头昏脑胀，两腿酸软，第二天清早，还得爬起来生火烧水，擦桌扫地，给师傅拾掇好工具。

第四天，我照常站在那里。这天师傅光瞪眼，不吭声，我不知怎么回事，也不敢乱动。到晚上，他又把我叫到跟前，气冲冲地问：

“你长眼干什么？睁着两眼喘气。”

“师傅你没说话，我不敢动。”

“我那有那么多的唾沫给你说话！”他把眼一瞪：“这回饶了你，下次要当心！”

以后，师傅瞅上水壶，我就去倒水，他瞅上扫帚，我赶忙去扫地，就这样他还不中意，一时干慢了，不是骂我不长眼，就是拧我的脖子。

熬过了七天，我刚想瞅着学点手艺，师傅又吩咐我：“柜上人使不开，你到后边伺候吧！”我口里不敢说，实意不愿去。这时，一个刚出徒的师兄告诉我：“伙家，我实话告诉你，看孩子、做饭……这是咱学徒的规矩，单讲学手艺，别

說三年，半年也用不了。”

打这我就落在师娘的手里。这师娘更难伺候，我替她端屎倒尿，抱孩子，烧火做饭，刷锅洗碗，她没个顺心的时候。孩子一哭，就拿我煞气，不是骂，就是打。你吃顿饭她也骂：“驴肚子”，“熊嘴鹁鸽爪”。别说吃，气就气饱了。

我熬一天算一天，盼一月又一月，指望有个出头之日，谁知越熬越难过。经常挨打、挨骂，还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在这个店里，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后来就偷着逃跑了。

那时穷人想吃顿饱饭，就得拿命换。在我被送去学徒的时候，父母又忍痛把十六岁的三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三姐的婆家开店，婆母是个出名的刁婆。她店里白天黑夜不断客，她就白黑不让三姐睡个囫圇觉。几个月的工夫，三姐被折磨得不象人样。她在婆家实在过不下去，偷偷地跑回家来，苦苦哀求母亲把她留在家里。那怎么行呢？母亲硬着心肠，对三姐说：“孩子，你是人家的人，怎敢不回去呢！”后来，母亲把三姐送回婆家，还给人家赔了罪。

三姐回去后，婆母更怀恨在心，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一次三姐端着一个大盆去泼水，失了手，把盆摔碎了。刁婆一看红了眼，拾起一个垫着劈木头的木墩，照着三姐的耳门打去，一下就打死了。

落 入 地 獄

我十八岁那年，身把骨稍硬实些，就想到码头里找点活干。可是，虽说码头是座“人间地狱”，但找活路的人，想走进那

个大门，也不那么容易。后来家里东取西借，凑了两块钱，托邻居一个码头工人央请说合，请把头喝了酒，才进了码头。

那时码头里都是卖苦力的，一扛就是二三百斤重的大包。我干了几天，肩膀压肿了，腿疼腰酸，为了一家老小，我想咬紧牙关干下去，可是力不从心。有一次进米一批乌枣，一包足有三百斤重，我扛起来腿直打战战。这时，有几个好心的工友，看我压得歪歪扭扭，不忍心，让我到车箱上去搭肩。我高兴地刚爬上车箱，不料叫一个搭肩的家伙（把头亲信）一脚踢下来，差点儿摔死。

那时我们进码头干工，就得加入“伙食团”，那“伙食团”可不比现在的“职工食堂”，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是封建把头包办的，一天三顿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窝头。就这样，狠心的封建把头，还嫌我们吃得多，叫伙伙把窝窝头弄得又苦又酸，有胃病的一点吃不下去，也不准退伙。饭菜这样坏，价钱却贵得要死。我们每月的工资，算去“伙食费”钱也就快光了。那时码头工人说不上媳妇，养不起家，十有八九打光棍。

晚上几百人挤在一间大窝铺里，象煎鱼一样，并排着睡，有时起来解解手，回去就挤不上了。这窝铺夏不遮雨，冬不挡风，工友们没有被褥，都是铺着草包，盖着麻袋。当时在码头里流传着这样的话：“一铺一盖，两条麻袋”，“铺着地，盖着天，头枕半头砖。”在窝铺里大伙开玩笑地说：“咱们就不怕起火，起火正好烧死那些臭虫、跳蚤。”

穿的什么呢？夏天还好说，都光着脊梁，肩上搭块麻袋

片；到冬天，碼頭崖寒風刺骨，就難熬了。工友們沒幾個能穿上棉褲棉祆的，凍極了，我們就找個草包，挖上個洞，套在身上，腰里再扎上根草繩子，一個個活象個稻草人。沒有鞋穿就到垃圾箱里去揀着穿。有一次，我揀了雙差伴鞋穿在腳上，大伙看了笑着說：“老申闖闖了，一雙腳穿兩個鞋鋪的鞋”。真叫我哭不得也笑不得。

挨餓受凍還不算，更可恨的是他們不拿工人當人待，監工、把頭喊我們“駝駱”、“煤狗子”，工人連牲畜也不如。養牲畜，到時候還得喂食飲水，可那時碼頭工人出的牛馬力，連口涼水都喝不上。

當時，碼頭里沒安水龍頭，到了夏天，每天早上，伙伙挑上几担涼水，倒在大鐵桶里，這點水，不到半晌就喝光了。到十點以後太陽正毒了，大伙汗流不止，這時想喝點涼水也撈不着，嗓眼里渴得冒煙，嘴里放白沫。後來，大伙實在忍不下去了，起了哄：“就是牲口到時候還得飲一飲，咱出這大力，連口涼水喝不上，不能干下去。”一呼百應，大伙一齊心，罷了工。開始他們不鬆口，我們硬斗，最後他們怕事情鬧大，被迫修上了水龍，從此我們才喝上涼水。

喪母棄子

日本鬼子的統治一天比一天殘酷，封建把頭的剋扣一天比一天厲害。這時，我娶了親，生了三個孩子，家庭負擔更重了。可是任我拼死拼活，一天在碼頭里干十五、六個鐘頭，一個月只能掙五、六十斤雜糧面，日子怎麼過呢，逼着全家

吃橡子面。那橡子面又苦又酸，里面还掺着些猪毛、头发楂。孩子光吃那东西，不見油，不見菜，就拉不出来，憋的又哭又叫，他娘就用草棒一点一点給他們往外扒。我在碼頭里，吃上那橡子面，再喝上凉水，肚子咕咕叫，止不住地泻肚子，后来連病帶累，漸漸支不住，也病倒了。

我病在家里，老婆也病得爬不起来，母亲就領着孩子出門要飯。她們要点稀的就喝下去，要点干粮就拿回来給病人吃。那时一天不出門，一天就熬不过去。有一天，大雪封地，天刚亮，母亲又提着籃子要走，我不忍叫母亲出去，忙叫住：“娘，这么大的雪，別出去啦！”母亲流着泪說：“咱不能等着餓死！”說罢，領着孩子又走了。

母亲出門后，风越刮越急，雪越下越大。我的心象刀絞一样，我在恨自己：“一条汉子，养不起家，反叫老娘冒着风雪出門要飯……”但反过来又想，这能說自己不出力嗎？不能。我的血汗都流干了！

我越想越伤心，旧仇新恨都翻出来。想着，想着，忽然大孩子跑回家来，哭着說：“奶……奶，”掉……沟……啦！”我一听，头嗡的一陣，两眼发黑，我强撑着站起来，跟着孩子，跌跌撞撞找到了母亲，把老人从沟底拉上来。回家来連餓帶病，不几天母亲就去世了。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說：“別餓死二小啊！”她老人家为儿女操劳一辈子，少吃缺穿，临死沒丢要飯棍，怎叫儿女不心疼！

母亲惦念的二小，他一下生就断了奶，餓的皮包骨头，眼看也活不成了。母亲死后，老婆催我說：“趁孩子还有口气，

快抱出去，給他找条活路吧！”我抱起孩子走出家門，他娘在屋里放声大哭。我的心象插上了一把刀子，忍痛把孩子送給老邻居李大娘，求她給找个主。她抱着孩子跑了几个門，人家一看孩子餓得不象样，怕养不活，都不要，最后把孩子送給了他姨。

險 遇 冤 害

病还没脫身，我咬牙站起来，拖着虛弱的身子，又回到了碼頭。

那一天我連着干了十四个鐘头，临下班时，腿都拖不动，不幸又叫日本鬼子抓了伏。日本监工硬逼我扛上三百斤重的大包，我那能挺得住，一步一个趑趄，走了几步，两眼一陣发黑，暈倒了。我撑了几撑，沒爬起来。这时，一个日本监工走过来，踢了我两脚，喝道：“八嘎，你的混蛋！八路的干活！”我一听，渾身出了一陣冷汗。那时碼頭里有多少善良的工友被加上了八路的“罪名”，无辜地被杀害了。我忙爬起来分辯，他們就把我架进了“刑詢室”。

我迈进了森人的刑詢室，一个留着小黑胡的日本鬼子喝問：“八路的在哪里？好好說。”我摇摇头。他把眼一瞪，接着出来两个汉奸特务，一頓棒子把我打昏了。当我被凉水噴醒后，見一个翻譯站在我跟前。我看他是个中国人，忙哀求說：“先生，我有病刚好，实在干不了，我不会搗蛋。”那翻譯把眼一翻，冷笑着說：“八路，皇軍很喜欢，你好好講，皇軍大大有賞。”我一听火上心头，反冲他問：“先生，干不了

活，就是八路嗎？”那汉奸翻譯一听，暴跳起来：“你敢反抗！”他向日本鬼子使了个眼色，接着又出来四个汉奸特务，把一根碗口粗的杠子，压在我的腿上。我只觉得浑身象通了电，豆粒大的汗珠滚下来。不一会，我又昏过去了。

醒来时，我已躺在門外冰凉的雪地上。这时，我模模糊糊地看着有几个工友朝着我身边走来，我哼哟着哀求：“弟兄們，誰行行好，替我說句公道話。”有一个素不相識的工友朝我看了看，站下了，他走到翻譯跟前說：“先生，我認識他，他是老碼頭工人。”那翻譯斜視了那工友几眼，轉身走回了“刑詢室”。我才連滾帶爬逃出了虎口。

那时工人那里还有点什么人权，日本鬼子、汉奸把头 and 特务混在一起，任意糟踏工人。

当时我們进碼頭干活，要过三道鬼門关。第一道是卡子門。我們走到这里，要从头搜到脚后跟，誰要被搜出一个火柴头，就得含在嘴里，头顶石头，在那里罚跪。第二道是检查哨。那里站着个日本鬼子，誰走到他眼前，不来个大鞠躬，就脱不了一頓毒打。最后一道是宪兵部队。里面淨是日本特务，专门監視工人的活动，有时两个工人說句私房話，被他們发现就說心坏啦，抓进去难知死活。

有一次，我走到检查哨前，忘了鞠躬，叫那日本鬼子一声喝住，劈头盖脸打了一頓，还罚我跪在崗棚旁。

那时候不知有多少工友，无故的死在这三道关口上。我們每天早晨离开家門，全家老小的心就挂起来了。早晚等我們回了家，才算又熬过了一天。

久盼失望

熬过了八年，日本鬼子投降了，青島开进了“胜利軍”，工人们滿以为这回可有出头之日了。誰知赶走一只狗，又进来一只狼。碼頭里，挂着膏药旗的軍艦开走了，挂着星星条条旗的軍艦又开进来。从舰上下来的美国兵，象野兽一样，任意糟踏咱們中国人。

当时我們在卸船，全班十九个人干活，背后跟着九个美国鬼子监工，他們提着棒子，随意往我們头上敲。中午歇晌时，这些兽兵吃得飽飽的，喝得醉醺醺的，把我們赶到太阳底下，逼着趴下，四肢支着鍋晒，他們站在一旁取乐，誰趴累了，肚皮貼着地，他們就用棒子敲。那时干一天活，就落一头疙瘩，窝一肚子气。

天长日久，吃气吃够了。有一次碼頭里进来一船汽油，正逢落潮，岸高船低，不好卸，监工的美国鬼子硬逼着往下卸，一卸慢了就用棒敲。这时，大伙窝在肚子里的气冲上心头，就在船仓里动了手，一陣叫我們打倒了几个鬼子，有两个被打断了胳膊。这下惊动了全船兽兵，一齐起来把仓口堵住了。仓頂上兽兵都握着武器，我們看窝在下边要吃亏，就一齐往外冲，當場有两个工友被打昏了。

我冲出来，急忙跑到港口宪兵队去报告。一个中国宪兵刁着烟卷，似理不理地說：“和盟軍捣蛋，自作自受，去吧！今天星期天，不办公。”

我一听，火冒头頂，憤恨地想：你們把野兽引进来，打

中国人，杀中国人，还称野兽是盟邦、友军，给他们争理，中国就败在你们这些败类手里。赤手空拳的工人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受人任意糟踏。

那时候物价一日三涨，依靠我的工资，养不活大家小口，没办法全家就靠吃“西餐”过日子。说起那“西餐”就恶心，那是美国鬼子吃下的剩饭，里面有剔牙棒、洋火杆、烟卷头，买回来拣一拣，放在锅里煮煮，就闭着眼吃下去。夏天“西餐”里苍蝇、蛆都有。有一次，“西餐”里打多了杀苍蝇的药水，全家吃上中了毒，大孩子毒得浑身红肿，起水泡，险些丧了命。

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不松口，整天这个捐，那个税，今日征兵，明天抓伏，逼得穷人无路可走。有一次，保长硬逼我交出四袋面粉，说是征兵税，交不上就要抓人当兵。我那里交得起，为了躲开保长的追逼，每天下了班，叫孩子给我送点饭，晚上就睡在树林里。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又熬过了四年。

幸福生活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青岛解放了。解放后第三天，码头里来了一位身穿灰布制服、脚蹬布鞋、手抹小烟袋的生人，见了工人分外亲热，开口就叫“同志”、“弟兄”。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么亲热的称呼，心里暖洋洋的。当天这个生人又给我们作报告，真没想到原来他就是来接管码头的王局长。这时，我们更觉得自己高了一半截。

开工第一天，还没干活，就发下了救济粮，接着又按人做上了新工作服。当大伙脱下那补钉罗补钉的破衣裳，换上新工作服时，眼泪簌簌地往下淌，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吃上饭、穿上衣还不算，工会又开上介绍信，让孩子去上学。当时我拉着一家七口过日子，工会按时给补助，所以我就对工会主席说：“孩子去上学，净给国家添负担，叫他在家拾煤核吧！”工会主席笑着说：“老申，过去咱码头工人的孩子进不了学校，现在学校是给咱们开的，有钱没钱都得上学。”后来孩子免费入了学。入学那天，父亲高兴地摸着孙子的头说：“孩子，你长得好时候喽，咱申家五辈子没出个念书的，你是头一个，可得好好念书，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翻了身，浑身的劲老觉得使不出来，刚要为国家出点力，不幸又把腿砸断了。那是在一九五一年。

在医院里，大夫诊断后说：小腿骨折了三段，要截肢。我痛苦地想：“截了肢，不能扛包，怎么为国家出力呢？”我没答应截肢。后来领导又聘请名中医给我接骨，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把我的腿治好了。

出院后，大夫还叫我在家休养一个月，我怎能呆得住呢！我想到解放前，有一次叫车弓砸断了两个脚趾，被逼离开了码头，全家跟着挨饿。看看现在，一条腿砸断三截，领导上包治疗、包养家，党委书记、局长、工会主席还都来安慰，越想越感动。第二天我就跑进码头，找领导要活干，领导不答

应我不走，后来把我分配到“老年班”。

这个班淨是快退休的老工人，整天干些拔草、打蒼蝇的活，工友都叫这是“享受班”。干了不少日子，我享不了这样福，就找老伙伴们商量：“咱不瘫不瘸，不能干这活，得要点实落活干。”老人都同意，经过我們再三要求，领导答应叫我們拉胶輪大車，規定三人拉一輛。我們看壯年工人两个人拉一輛，我們就两个人拉一輛。拉了些日子，大伙干得还不过癮，又要去卸車，领导劝阻不下，又答应了。打那，这班老人算是复了原，大伙硬标着小伙子干，工班效率赶上了壯年班，一次又一次被評为先进班，大伙还一次又一次地評我为先进生产者。

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港务局建立了职工医院、俱乐部、子弟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碼頭里还专为我們修上了职工澡塘。几年来，一批接一批盖起了新宿舍，大部分职工搬进了新房子。一九五九年我家也搬进了新建宿舍大楼。解放前，我在青島住了三十五年，沒住上間瓦房，这次搬进玻璃窗門、地板地的大楼，全家老小从心眼里感謝党和毛主席。

看看我現在的家，真是個幸福的家。大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記住过去的苦，入伍后，听首长的話，勤学苦练，加入了共青团，还被評为五好战士。大女儿一九五八年进了工厂，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入了团，多次被評为优秀团员、青年紅旗手和先进生产者。那个在旧社会送不出門的二小子，今年也高中毕业了。老伴也被群众选为妇代

会主任、居民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她都被评为模范家属，和我一起参加了青岛市群英会。如今，逢年过节，孩子都回家，团聚在一起，就自然地开起了家庭会，谈谈生产学习，比比干劲。我也常对他们说说心里话：“咱们都得好好干，永远也不要忘了本。”

血海深仇永难忘

博山电机厂二車間代理工段长 张敦昌

我叫张敦昌，今年三十二岁，是博山区十字路村人，現在博山电机厂二車間当代理工段长。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苦孩子。一想起那时我家的生活，就叫人心酸、愤怒。旧社会真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啊！

三代都是受苦人

我家在旧社会里，終年給地主种地、推小車、干工，过着半飢半飽、衣不遮体的生活。我的爷爷推了大半輩子小車，很穷苦。我有三个伯叔。大伯是个佃农，給地主种地，虽然起早貪晚地干，累弯了腰，也难得过上一天好日子。三叔是个画工，解放前在博山送道街一家私营玻璃炉画内画瓶，白天黑夜地劳动，收入仅能糊口。四叔是个推小車的工人，一九四三年大歉年时，他全家四口人下关东逃荒，后来都死在外边了。

我父亲是个身体结实、性格刚强的人，有做玻璃的好手艺。为了一家大小九口人（我們兄妹七个）的生活，他夜里在資本家的玻璃炉上干工，白天推小車。这样拼命地干，我們还是吃了早上愁晚上，經常揭不开鍋。后来父亲又租了一个姓馬的地主的九亩地来种。他除了干炉工、推小車以外，

又要下地干活。我母亲与我十几岁的姐姐、八九岁的哥哥也常年在地里滚。全家辛勤地劳动，仍然吃不上一顿饱饭，穿不上一件象样的衣服。

一张卖身契

一九二七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侵入中国，穷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我父亲由于长年劳累，一天天地瘦弱下来。在旧社会里，穷人是生不起病的，不光没有钱进医院，还得照样劳动，不然就饿肚子。就在“七七”事变这一年，资本家停了玻璃炉的生产，父亲失了业。那个姓马的地主，看到父亲有了病，嫌我家没有劳力，也抽回了地。父亲只好支撑着有病的身体，继续推小车来维持一家的生活。这时，我十五岁的大哥到馮八峪煤矿干了勤杂工，十二岁的二哥也到一家磨坊去当学徒。

在旧社会里，灾难说不定那霎就轮到头上。一天，我到馮八峪煤矿找大哥，看见他的手吊在胸前。他告诉我：“我的手腕叫日本鬼子打断了，你家去千万别说，免得爹娘挂念。”当时我俩大哭了一场。在磨坊学徒的二哥，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打骂，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两个哥哥的遭遇父亲知道后，气血攻心，一下子跌倒在地，得了半身不遂病，连话都说不清楚。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三岁的小弟弟也得了白喉，无钱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母亲急得没有办法，去给一个姓吴的大夫磕头，求他给父亲看病。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给我十七岁的二姐提媒，要嫁给

一个年紀比她大二十五岁的姓魏的资本家。并說这个资本家愿出高价聘礼。这那里是什么婚姻，明明是趁火打劫，逼着我們卖人！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喃喃地表示：“不，不能！我們人貧志不短，餓死也不能卖亲生女儿。”說完，他就痛苦地暈过去了。母亲、姐姐，还有妹妹，一直哭了一天一夜。

旧社会是沒有穷人的活路的。懂事的二姐，眼看着臥病在床的父亲无錢医治，又看看一家老小无依无靠的生活，哭着向母亲說：“娘！就把我卖了吧，先給爹治病，你們好活下去……。”这刺人心肺的話又使我們大哭起来。一家人含着眼泪，忍着痛苦，送走了我的二姐。使了姓魏的资本家伪鈔四百元，还立了一张生死张家不許干涉的契約。

“兒童監獄”

一九四三年是苦难深重的一年。日本鬼子实行“第五次强化治安”，疯狂地扫蕩抗日根据地，隔絕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四乡粮食进不了城，加上这年大旱，农业歉收，老百姓簡直无法活下去。树叶、树皮早已被人們吃得精光。奸商、地主囤积居奇，粮价随风上涨，常常是上午能买到一斤粮食的錢下午只能买儿两。那时候博山街头上每天都有餓死的人。許多穷苦人家卖儿卖女，逃荒要飯。

我父亲抱着半残废的身体，依旧推小車。他在我二哥的帮助下，到神头发电厂筛煤炭渣，拣焦木子，推到市里去卖。一天的劳动所得，仅能买二斤豆子。一家五口每天就靠这二斤豆子哪能活。这时，伪頑县政府和商会的那些人，突

然发起善心来。他們办了一个“儿童收养院”，宣传把孩子送到院里可以吃得飽，穿得暖。母亲去給大地主张煥臣（商会会长）磕头，把我和小妹送进了收养院。这个所謂慈善的“儿童收养院”，地地道道地是一座“儿童監獄”。

“儿童收养院”設在博山东关南亭子（現在圖書館的地址）。周围是很高的墙，只有一个木栅栏式的大門，象監獄的铁門一样，每天鎖着，不准小孩子們出門一步。父母也不能进门看望自己的骨肉。每天我們都是拥挤在大門里面，盼望着慈爱的爹娘来隔門看望一下。

我們初进院的时候，每天还能喝两次瓜子面子掺几粒小米的稀飯，一次一碗，根本吃不到菜。以后，一碗稀飯減成半碗，許多孩子餓得哇哇直哭。大点的孩子就去摘院里树上的叶子来吃。就是这样的生活，那些“大人”“老爷”們还到处吹嘘他們的“善心”、“阴功”，趁机募捐要錢，騙人自肥哩！

住在收养院的儿童，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大的七、八岁，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都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也根本无人来照料我們的生活。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間屋里，睡在地上，枕块半头砖。虱子、跳蚤、臭虫成了蛋。小孩生了病根本无人管，每天都有几个死去。后来天气漸热，死去的小孩无人掩埋，常常腐烂生蛆，臭气熏人。

我和小妹在这个活地獄里住了六、七个月，就病倒了。我們头很大，腿很細，肚子老大老大的，簡直不象人样。后来又全身肿了起来。小妹两只眼都看不見了。我去的时候穿着一双大人鞋，整天拖拉着，后来肿得根本穿不上了。有一

次母亲来看望我俩，我們已經爬不到大門前去，只好对着大門哭喊，母亲心痛得暈倒在門外。最后父亲把我和小妹背回家里，离开了这个活地獄。小妹来家养了二年多才恢复健康。直到現在，我回想起那种生活来，心里就难受。

当了童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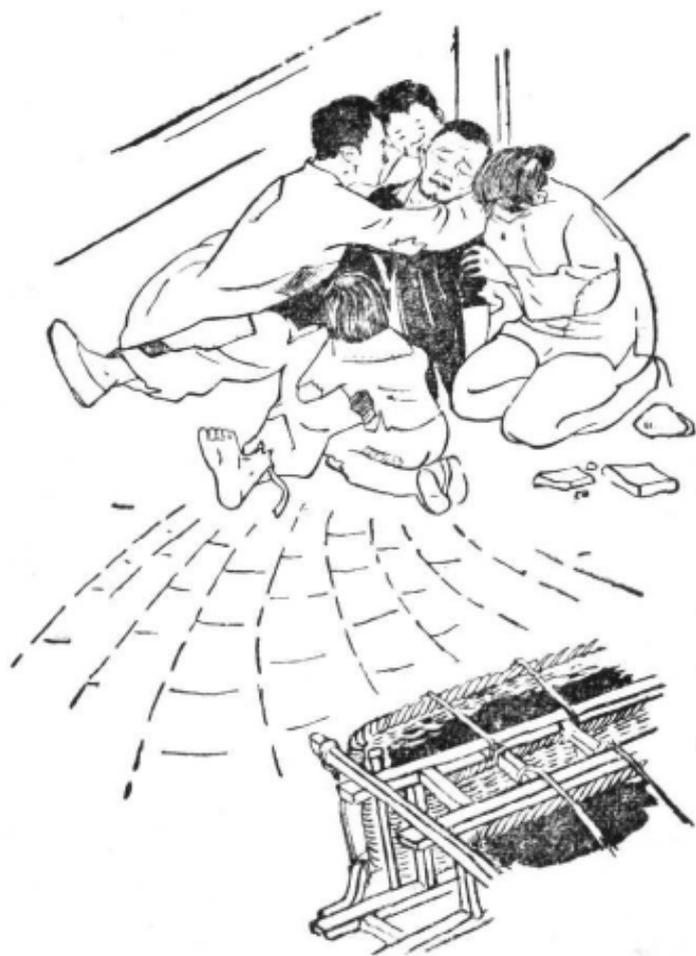
我从“儿童收养院”出来以后，养了一个时期，就支撑着瘦弱的身体，开始了我的童工生活，跟着二哥在山头火車站炭場拣炭。在旧社会干工和現在工人对比，真是天地之別。资本家对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童工，照样残酷的剝削。早上，天空的星星还在眨眼，我們就得去上工，晚上星星出来了才收工，一天干十五个小时。在烈日当头的伏天里劳动，口渴了喝凉水，热病了无人管。有一天，我們这些小伙伴都得了急性霍乱，病倒在炭場里，城西村李家兄弟二人，当场就死掉了。旧社会死一个童工，簡直不如死条狗。我掙扎着回到家来，沒有錢請医生治，母亲就用一个縫衣針，把我全身都扎遍了，放出了一些黑血才侥幸沒有死去。

家破人亡

一九四六年春节，有錢的人家，杀猪宰羊，置办年货，穿着嶄新的衣服，欢欢乐乐地过节。可是穷人家过年好比过关，吃穿都顧不上，哪有心思过这个。我記得有好几年我家連一頓餃子也吃不上，这年春节也不例外。我和小妹沒有新衣服，就关在家里不出大門。

就在这年春节，我那年已五十岁的父亲，为了使我们一家人吃上一顿饱饭，拖着半残废的身体，从大年初二就去推小車。

我们一家人每当父亲推車走出家门就提心吊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九四六年古历正月十四日，父亲推車出去不久，就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说：“你父亲在大街上死了。”我和二哥、小妹扶着年老的母亲，慌忙跑到街上去看，只见小車停在街旁，父亲靠着人家的房柱子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手足早已冰凉了。我们抱着父亲的尸体



体嚎啕大哭，一家人失去了主张。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变卖了父亲推的小車——这是全家唯一的财产和吃饭工具，才把他草草地埋葬。我的父亲就这样被旧社会折磨死了。

父亲死后一年多，我家又遭了塌天大祸，国民党匪軍把我大哥、二哥一起抓走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博山城。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博山城曾被我军解放一年多。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斗地主，刚刚有出头之日，可是，乌云又遮住了太阳。那些蒋匪军，加上地主、汉奸、恶霸组成的“还乡团”、“复更工作队”疯狂地屠杀。敌人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下，几乎天天在杀人，杀我们的革命干部及家属，也杀无辜的老百姓。李家村下（即现博山公园）的孝妇河岸上，经常摆着一具具被敌人杀害的尸体。我记得我家附近大街上有一家商号，主人留一个解放区的同乡住了一夜，因违反了反动派的“五家联座”制，就被他们连主人加客人一起枪毙了，其余四家联座户也被绑去“陪决”。

在博山解放期间，我大哥在村里当了一个时期的村干部，我也参加了儿童团，人民政府还贷给我家北海币一千元，叫我们搞家庭副业生产。国民党反动派回来后，说我家是“匪字”，在我家户口上注一“特”字，在每个人的国民证上都盖上“匪字”二字限制自由活动，不准出城门。敌人就把我们几家所谓“匪字”联在一起。每天晚上查三次户口。我大哥每天都被叫到保公所干苦役，受尽了打骂侮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北风呼呼地吹着，天上下着小雪。我们一家人快要睡觉了，突然蒋匪镇长高海泉，带领着十几个保丁，荷枪实弹，闯进我家。他们气势汹汹地硬说大哥是共产党嫌疑犯，立刻将他捆绑起来。接着又把二哥强征壮丁，和大哥捆在一起带走了。以后我母亲到一个姓孙的保长家去请求留下二哥，这个孙保长，大发雷霆，竟把

她老人家轟出門外。

两个哥哥被抓走以后，都被敌人强迫当了兵，家里只剩下了我們孤弱三人，更无法活下去了。母亲就把我和小妹送到舅家去，帮他家干些零活，混口飯吃。

重見天日

春雷一声响，受苦人重見太阳。一九四八年三月博山最后解放。从此，我們一家人从死亡的边缘上被党救了回来。我大哥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回了家，現在当了干部，在市人委工作。二哥在我軍解放淄川时，参加了解放軍，成了共产党员，当了海軍軍官。我自一九五〇年到博山电机厂干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也入了党，文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們弟兄三个都結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小妹也参加了工作。

我經常地回忆过去，对比現在，忆苦思甜。我深深感到，只有不忘过去的苦，才能知道今日的甜。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永远忘不了过去阶级压迫的苦。我要一辈子听党的話，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还要用我的家史教育自己的孩子，使他們也記住阶级压迫的苦，懂得憎恨敌人，把他們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

刘同昌整理

从苦难走向新生

——記青島大港碼頭工人楊華云的悲慘遭遇

一列滿載煤炭的火車，喘着粗氣停駛在一號碼頭專用綫上。楊華云駕駛着十噸吊車，急急迎了上去，帶抓斗的鐵臂馬上揮動起來。不一會，火車旁邊就出現了座座煤山。工人們看到老楊那嫻熟的技术，同聲稱贊說：“看，吳師傅又趕到頭里了！”“老吳真行！”

他明明是楊華云，為什麼有人叫他老吳呢？當我把這個迷惑不解的問題向老楊提出時，只見他眼圈一紅，扑簌簌滾下幾顆眼淚。原來，他的姓名後面埋藏着一部血泪史哩。

逃 生

楊華云這個名字，還是解放後才起的。他的原籍是河北省新安縣。家中几輩子都靠租種地主土地過活。當他六歲那年（一九三一年），家鄉遭受水災，地里顆粒沒收，可是地主還是三天兩頭上門逼租逼債。父親楊萬有眼看沒法活下去，就用兩個草簍子挑着弟弟妹妹，母親拖着他和姐姐，一家六口向外要飯逃命。他們不知走過多少村，跌過多少跤，也不知被狗撕破多少皮，弟弟餓死了，母親累病了，好不容易挨



到了天津。全家人滿心想这下可以摆脱地主的压榨了，在这文明的城市可以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了。但是，那些恶警、流氓对这些善良的“乡下佬”，就象蚊子见了血，更是任意欺凌，逼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市外的一个棚户区用几块破席头搭了个屋子，白天四处讨饭，晚上就宿在这里。下雨天身子底下和了泥，冬天就成了雪窟窿。后来，父亲看看孩子一个个肚皮贴到了后背上，知道光靠讨饭不行，就托了些穷兄弟担保，雇给人家拉大车，母亲坐在一条马路旁边缝破烂，替那些出苦力的穷兄弟缝缝破衣、鞋、袜，凭各人心意给三分二分钱。他们就这样一把泪一把汗、有一顿无一顿的混着穷日子。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连这样艰难的日子也不让过安稳，时时都会有着不幸降到他们的身上。

失 散

过了年，华云已经七岁了，略微懂得了父母受的辛苦。为分担老人的忧愁，也找了个破篮子，同姐姐、邻居的小伙伴到处拣煤核、拾破烂。

有一天晚上，华云背着盛满废纸烂布的小篮子，踉踉跄跄回到了“家”。一天水饭没打牙了。隔壁老远就叫娘。可是没有应声。到屋里摸摸，一个人也没有。他一个人无力地坐在地上等着。九点多钟父亲也拖着疲惫的双腿回来了。爹俩默默地直等到深夜十二点多，还不见人影。华云着急地问：“爹，娘和姐姐妹妹上哪去了，怎么还不回来？”这句话好象一下刺痛了爹的心，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着华云的头，声音低沉地说：“孩子别难过，这是咱的命运……”原来他早就听穷兄弟们讲过流氓拐骗、贩卖人的事情，一想到这里，便哽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华云的脸上，华云也放声大哭了。爹俩头抱头，整整哭了一宿。

天亮时，有些邻居知道了，都来劝慰。华云的父亲除了嘱咐华云一顿外，又拖着无力的双腿拉大车去了。真是祸不单行。这天在搬运钢轨时，因为手下无力，一根六七百斤重的钢轨一下砸在脚上，顿时左脚肿成了个气球，幸亏几个穷兄弟把他背回家来。这时，仅仅七岁的华云，白天到外面讨些冷汤残饭侍候父亲，晚上烧些艾草水治疗父亲的伤。一连一个多月，看看父亲能放下拐杖了，心里才松散下来，可是想想失散的母亲姊妹，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黑云。

被 騙

过了些日子，父亲又拉大車去了。有一天上午，华云忧伤地坐在屋子旁边，心里正想念着母亲。忽然有个穿黑大褂的陌生人出现在华云面前，弯下腰，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孩，你不想娘嗎？”

“想！”

“我領你去找好嗎？”

“在哪里？好！”

华云心里乐哈哈的，一面詢問娘在哪里、为什么不回家，一面跟着陌生人来到了火車站。起初华云还記住父亲的嘱咐，可是一想馬上就要見到娘，再加这个陌生人死拉硬扯，也就上了火車。华云的小臉紧貼在車窗上，貪婪地望着急急后退的树木、村庄、原野，但他焦急的心情还嫌火車跑得太慢。列車奔馳了一天多，那个陌生人才領着华云在山东的禹城車站下車。然后，把华云領到僻靜地方悄悄地說：“見了人就叫我哥哥，不准多說話，乱說就見不到娘。”

这个人同华云来到一个集市上，只見他鬼鬼祟祟地同这个啦啦呱，同那个捏捏手，后来就在一个卖烟摊上坐了下来。不多会，那个卖烟的就把鈔票遞給了他，他急急塞进大褂里面，又回头癡笑着拍拍华云的头說：“以后就叫他爹，他領你家去找娘。”华云当时虽然还不大十分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看到那人的鬼祟样子，知道是被騙了，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当他醒过来时，那个騙子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出 走

这个卖烟的人，名叫吴斋林，家住禹城，因为没有子女，收买华云原打算做个义子，就给他起名叫吴连福。这个名字一直叫了二十多年。可是过了一年，吴斋林的老婆又生了个男孩，华云便成了他家的佣工。吴斋林本来是个见钱眼开的买卖人，平日里对华云不给吃不给穿，却要他象大人一样挑水、拾草、喂猪，一时做不周到或做慢了，还要挨打受骂。十冬腊月还让他穿条破单裤子，并逼着他天不亮就起来去拾粪。有些邻居知道了他的遭遇，常常偷着把他叫到家里暖和一阵或给点热汤热饭吃，但被吴斋林知道，又是一顿毒打。后来，吴斋林死了，老婆待他更苛刻，活嫌做少，饭嫌吃饱，小孩子一哭，就拿他出气。有一次被她的小孩砍了一斧，反又挨了她一顿痛打。泪水把华云养到十六岁，看看实在没法受那个窝囊气，便在一九四一年跟着招工头含着眼泪离开了第二个“家”。

刚刚十六岁的杨华云，一下被运到了广东，在日本鬼子刺刀逼迫下，为他们砸石子、修铁路。因为乍到南方，水土不服，常常泻肚子；石子崩到皮肉上，就要溃烂，日夜还有日本鬼子看守，稍一直直腰、停停手，马上就会挨皮鞭、棍子。有一次在砸石子时，一块石子崩到日本监工的身上，就立时被绑起来，一连打得死了三个死。幸亏工友们跪着哀求，才算饶了他的性命。

流 浪

第二年开春，楊华云和几千名工友又被招工头和日本鬼子押到了东北，在长春以南的地方挖河。那时河道里还結着厚冰，他們被逼着挽起褲腿、踏着刺骨的冰冻开方、运土。一副担子百多斤重，一落到肩上，身子直觉往地里縮，脚踏到冰地上，同猫咬的一样。一走慢了，“拉杆”的沒头沒脸的死打。华云在这里干了一两个月，每个骨头节都象酥了一样。看看这个罪实在沒法受，就趁一个黑夜逃跑了。

一夜不知爬了多少山、跑了多少路，衣服被荆棘撕破，两脚被乱石扎烂，直到爬不动时才在一个山脚下坐了下来。可是跑到哪里去？家，沒有；亲人，沒有。他想起了失散十几年的父母姊妹，想到自己孤身一人的苦难生活，不觉眼泪象决了堤的河水，怎么也堵不住。他气愤地说：“老天也太不公平，难道穷人連半条生路也不該有！”当他想到如果被抓回去不死也得脫层皮时，便把心一横，直挺挺地躺在一条公路上，滿心想有从这里經過的汽車一下軋死，不再看見那个肮脏的世界。可是直到天明，也沒見一輛汽車。他想：也許还不到死的日子。只好把眼泪抹掉，爬起来再走。后来逃到了长春。当他在一个工人住区停下来时，想想一个人举目无亲，肚里又飢又渴，不觉又偷偷哭起来。这时，有个穿得很破的老太太經過，看見华云在哭，就問他哪里人、找誰？华云看她那和善的面孔、单寒的穿戴，知道也是穷人，就把自己的遭遇向她講了。老人一面擦着同情的泪，一面安慰說：“我

家也是做工的，等老伴来家商量个办法。”后經老人托情，才找了个地方打“卯子工”。但是，那时內受阶级压迫、外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旧社会，穷人走到那里也要挨打挨骂。在这里被工头、日本鬼子打得受不了，他又跑到了哈尔滨、牡丹江，后来又流浪到青島。他扛过包、抬过盐、討过飯……不管到那里、干什么，所碰到的都是铁靴、皮鞭、棍棒，旧的伤痕上面不断出現新的伤痕，一层伤疤刚脫又結上一层。

好容易盼走了日本鬼子，又换来了国民党和美国佬，原来穿大褂戴礼帽的把头，换上了蓝制服、大盖帽，仍然挥舞着原来的棍子、鞭子抽打工人。那时华云在大港出苦力，一上班就是一二百斤重的盐筐、煤筐日夜压在肩上，一滑脚就会从几丈的高垛上跌下来，輕則皮破肉开，重則伤筋断骨。可是工人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資，工头还要先拿去“发过了芽”以后才发給，等到工人手里，就和一堆废纸差不多。逼得沒法，只好啃点冷餅子，穿把破“七絛”，十冬腊月也沒双新鞋，只好用麻袋片子把脚一包干活。华云常常想：“穷人大概沒有出头的日子了。”

新 生

漫长的黑夜终于破晓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人們盼望已久的那面紅旗插上了青島这座苦难的城市。在旧社会呻吟了二十四年的楊华云，从此走上了新生。当他站在大家面前控訴旧社会的罪恶、向把头清算阶级兄弟的血債的时候；当他伸出結实的双手选举自己

称心的管家人的时候；当他第一次从那又黑又湿臭气熏人的“窝铺”搬进宽敞明亮的工人宿舍的时候，总是浑身热血沸腾，心里乐得开了花。后来领导又培养他驾驶吊车。当他第一次坐进驾驶室，用机械装卸货物时，心头更是久久不能平静，“抬煤抬盐，压不断的铁锁链，铁锹不离手，杠子不离肩，踏着九寸桥板去登天，累得腰弯双腿瘫”的歌谣好象又响在耳边，工人们跌死跌伤的惨景，好象又浮现在面前。一想到旧的往事，再看看手里的操纵杆，他的干劲更足了。

人越往好处过，越是忘不了旧社会的苦日子。杨华云在吃不愁穿不愁、愉快的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常常想起那失散的母亲和姊妹不知是否还在人间？那孤苦伶仃的父亲，不知流浪到哪里去了？一个人没个家，连个真实姓名都没有，心里多难过？特别是逢年过节，看到别人欢乐的笑脸，自己常常暗暗掉泪。一九五七年新年时，有一次他在抹泪，被队长看见了，便说：“吴师傅，有什么困难吗？”当他把自己的要求和希望讲了之后，队长说：“这好办，只要他们还活在人间，党一定会帮你找到。”马上帮他给天津写了一封信。过了一些日子，就从天津回信了。原来他父亲在解放后已经成了铁路工人，并于一九五六年退休，不过他去信时，父亲早在半年前已因病去世。母亲、姊妹因为名字不清楚，一时还未找到。当时，华云虽然觉得没有和失别二十多年的父亲见见面心里有些难过，但在知道父亲已经看到被蹂躏的劳动人民见到光明时，也感到极大的安慰。于是，他就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把叫过二十多年的吴连福，正式改名

叫楊华云了。

創 业

解放以后，楊华云結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不过，在他心里經常想着的是另一个家，那就是机械站、吊車队、日夜沸騰的大港碼頭。他知道，現在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建設强大的祖国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自己的責任。毛主席已經給我們搭起了社会主义的大厦，要把这个大厦建設得更美好，还要靠大家勤奋的劳动。因此，他每天总是早来晚走，工作細心認真，碰到一块电綫头、一个螺絲釘也要弯腰拾起来，为了搶修設備一連干上十几个小时也不覺得累。由于他工作积极勤奋，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連續有八个季度被評为机械站的先进生产者。

一九六一年二月，被旧社会折磨出的胃病忽然又犯了。領導为照顧他的健康，給他一定假期讓他在家休养。有一天队的党支部書記刘化佳带着魚到他家探望他。老楊握着刘化佳的手，心里热乎乎的，眼泪象断了綫的珠子，一下涌了出来。不过这与在旧社会流的泪不同，这是感激的泪、幸福的泪。党給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在旧社会到处被迫害被欺凌的孤儿，如今有点小病領導和工友們經常問寒問暖；在旧社会出着牛馬力的“苦力”，如今不光駕起了机器，还当了吊車队的班长，怎不使他感慨万分！他送走了刘化佳，打开了收音机，来自全国沸騰的生活和喜悅的消息，又給了他巨大的鼓舞。他想：党把这样重要的机械交

給自己，是多麼光榮、幸福和自豪！別人都在日夜勞動着，自己有點小病就休息嗎？他越想越呆不住了，便不顧妻子的勸阻，偷偷跑回吊車隊。當隊長、書記提出沒有大夫的復工證明不准上班時，他搓着雙手笑笑說：“讓我干一個鐘頭，心里也痛快。”說着就跳進了駕駛室。

現在，老楊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了。每當下班以後，他總喜歡領着戴上紅領巾的愛子，漫步在宿舍附近的寬敞的延安路上，一面欣賞一天天正在變化的青島，一面教導孩子說：“要記住，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咱們世代受苦的窮人那會有今天！”

胡希彝

俺家的血泪史

蓬莱县刘家沟公社安香店村 閻季华

我叫閻季华，今年六十八岁了，家住蓬莱县刘家沟公社安香店村。我那死去的老头子叫于振财。我这一辈子经过了清朝、民国和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算是走了三个社会。要说哪个社会好？还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好！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再看看如今的年轻人，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是天上地下。

九岁要饭跑百村 狗咬大腿血淋淋

说起来，在解放以前，我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呀。娘家爹妈是从栖霞逃荒来到蓬莱的。我六岁的时候，就替妈看孩子，妈去要饭。九岁那年，我就领着弟弟去要饭了。那时财主家的狗又扑又咬，我怕狗咬着弟弟，赶快去给他挡着，狗就咬在我的腿上。现今我腿上的这个大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腿叫狗咬了也没钱治，就用泥糊，用树皮贴，越贴越烂，腿化了脓还得去要饭。要回来一些冷干粮，娘不舍得吃，我也不舍得吃，除了给弟弟、妹妹吃点外，我就又送到山里，给在那里干活的爹爹吃。就这样我长到了十七岁。古语说：“穷人养不起十八岁的闺女”，十七岁这年我就出嫁当了媳妇。

“穷得穷、富得富，肩膀四平是亲戚。”我嫁给了于振财，他也是个穷光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地主横行出狗殍 好人受欺丧残生

人要脸、树要皮，稍微能有一口吃的，谁也不愿拉着棍子去要饭。我到于家以后，那阵子老头子还年轻，他打个短工，给人家当个瓦匠，好歹还能对付着挣口吃的。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日子就过得累了。没办法，租了地主二亩涝硷地。二亩地成了全家的命根子。我和老头子商议，种什么能多打把粮。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合计来合计去，还是种上了大白菜。当时老头子管的细，白菜长的挺好，可没想到一到黑天就叫什么给扒了，一连几天，白菜扒的乱七八糟。到手里的饭碗眼看就要打了，谁能不动心！老头子发火了，就在一天晚上到地里看白菜，他这才知道扒白菜的是只狗。他一生气就借了杆火枪把狗打死了。这一下可闹下了塌天大祸。

这条狗是地主吴佩林家的。地主知道了狗是俺老头子打死的，当天晚上就拿着条铁锁链子找来了。当时提出两条：一条是给狗偿命，一条是带着锁链子替狗看门子。老头子吓跑了，孩子吓得直叫唤。乡亲们都来给说情：“要叫于振财偿了命，他家老婆孩子怎么活呀！”大伙好话说了八千六，地主才给了个“面子”，叫把老头子找回来，给狗出殍。乡亲们找来了老头子，东借西取，给狗做了口棺材。这工夫狗肉早叫地主的伙计们煮着吃了，就把他们吃剩的狗骨头装进棺

材里，老头子披麻带孝，象个大孝子一样給狗出了殯。同志們！在旧社会里穷人的命还跟不上地主家的一条狗啊！这一場狗殯拉下了飢荒，老头子連气加窝囊得了病。后来没办法，就把亲生的闺女二斗粮食卖給了刘家沟。闺女第二天就要出門子，病了一



年多的老头子就死在炕上了。这陣子家里要办喜事，又得出丧，我真象是在針尖上，心里是个啥滋味啊！我把闺女送到邻居一个大娘家里准备出嫁。闺女这陣子哭也哭不上来，說也說不上来，她也知道爹媽穷的沒有法子。闺女說：“俺爹死了，要衣裳沒衣裳，要棺材沒棺材，把我这双袜子給爹穿上吧，也算我当女儿的尽了孝。”闺女說着把她准备作媳妇的还穿在脚上的袜子脫下来，自己光着脚到婆家去了。

丈夫一死塌了天 苦难日子似熬煎

老头子一死，我这个老娘們拉着孩子过日子就更苦了。

那工夫我才三十九岁，老头子死后，我还带着身子，我的三儿子于德海就是个背生子。看看现在，妇女生孩子都到妇产医院，没妇产院的也请个接生员来。我生于德海的时候，第二天就得下炕去要饭。穷邻居们心里不过意，有的送碗米，有的送瓢面，都说叫我坐月子吃。孩子们都瞪着眼，我哪能吃得下！我就把这些米面和山药，做成菜汤一家人喝。有一年，一连下了几天雨，饭也要不着，黑了天，孩子饿得哭，当妈的这阵是个啥滋味？我说：“好孩子，别哭，快睡吧，等天明妈去要给你们吃。”冬天，全家人顶着一床破被睡在土炕上，孩子们冻得直挣被，睡在炕外面的大儿子，怕兄弟们挣被自己捞不着，找了两个钉子，把被钉在床帮上。那时候的穷日子，真是过一天挨一天，每到天黑，我躺到炕上就想：“今天是活过来了，明天还能活到天黑吗？”

天天受穷无法过 处处受气更难挨

旧社会的穷人不光受穷，还得受人家的气。后来大儿子长到十来岁了，我心里想：我受穷不能叫儿子再受穷，送儿子上学吧。一天，我送儿子上学堂，校长说：“你能拿起学费吗？穿的这个破烂样，哪象个学生？”怎么也不收。我托亲求友，好歹说着才收了儿子进学堂。因为家里穷，儿子在学堂里天天挨打，打的孩子手肿得吃饭都拿不住筷子。穷人的孩子在街上玩也受气。有一次，三儿子于德海和地主刘涵臣的孩子玩恼了，刘涵臣家的孩子说：“小要饭的，你吃俺的干粮给拿来。”后来于德海把他惹哭了。刘涵臣提着棒子出来撵我

的孩子，孩子吓得來家關上了門。劉涵臣三腳兩下把門踢開，我連忙跪下給他說好話。說好話也不行，他把我的孩子打得連屎都拉在褲襠里了。

人窮了，不光孩子受氣，大人也受欺負。有一年大年三十了，我硬着頭皮到惡霸劉春臣家借了二升糧，以後還不起，又怕人家要，擠空我就去幫他家干活。秋天了，窮人都忙着抓把草好留着冬天燒炕，惡霸老婆却打發孩子來叫我：“俺媽說，你欠俺的二升糧俺不要了，叫你去幫俺扒苞米皮。”他家里的棒子堆得象山一樣，就靠我一個人扒了十幾天才扒出來。住了幾天，他的孩子又來了：“俺媽說，你借的那二升糧俺不要了，叫你去給俺扒苞米粒。”以後又來叫了好幾回，就這樣，因為借了二升糧還不上，就給人家使喚起來沒個完。解放後，我把這些事說給媳婦、孫子們聽，他們說：“這是熊人，你不好不去？”天哪！誰敢不去呀！那時候窮人的命都攥在有錢人的手里，窮人在人跟前，連口粗氣不敢喘，步小了不行，步大了不敢伸。就說惡霸劉春臣吧，我去他家趟數多了，他就說：“他媽的，這是一時又弄不到吃的了。”有時怕人說這話，去他家的趟數少了，他就罵：“他媽的，這是一時又吃上飯了。”有一年，他外出的兒子來家了，帶來很多好東西。咱要到他家去，怕他說咱餓他的東西，我就好些日子沒有去。惡霸就罵起來了：“她知道我兒子來家了，有些衣服要洗洗漿漿，她倒拿把了。他媽的，把她的房子給扒掉！”我聽說後，趕忙借了幾個雞蛋，到他家去了，給他洗了幾天衣裳，累的肋巴骨頭都痛。那時候，惡霸跟城里的大漢奸郝銘傳是

个干亲家，誰也不敢得罪他，咱穷人更是惹不起。

想想过去不忘本 看看現在幸福多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这陣子真是在天堂上了。我是一九四六年入党的；我三个儿子現在也都是党员。大儿子于德明在部队里当军官，二儿子于德亮在輪船上工作，三儿子于德海現在生产队里当队长。如今是，三个儿子三房媳妇。这是我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事啊！我常常自己想：我的日子是怎么好的？是听党的話，跟着毛主席走好起来的。从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跟着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我的日子跟大伙一样，一天好似一天，一年强似一年了。

我常对孩子們說：“咱們一家人，要不是党和毛主席，早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前两年俺这地方受灾減产，政府一次一次地救济俺，要在旧社会，誰还管你这些！党和毛主席是咱的亲人，公社就是咱的家，在队里干活，千万要上心，集体的活就是自己的活。”話又說回来，咱不能忘了过去，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本。

蓬莱县广播站整理

大 年 夜

临清市尖庄公社西赵庄大队 赵景江
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

欢乐的春节就要来到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刻骨难忘的大年夜。

那是一九四三年，我才十四岁。那年遇到了大灾荒，我家的二亩半地成了个积水坑，别说收粮食，连一棵草也没见。可是鬼子、汉奸照旧催粮逼款，而且要得更凶。我们全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弟弟和我，每天吃到肚里的东西，除了草种子就是树叶子，甚至一天天的不动锅，都饿得浑身上下皮包着骨筋，脸象黄纸似的贴在骨头上。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是那二亩半积水坑欠下的税款，伪村长天天领着人找父亲逼账。为了躲避那些吃人的野兽，父亲就天天领着我到地里采树种子或到外村去讨饭，天不到漆黑不回来，这样一天一天往前挨。那些伪村公所的家伙们抓不着我父亲总不甘心。古历十月的一天夜里，天阴得漆黑，伪村长勾结伪乡长带着人来抓我父亲。父亲跳墙跑了，刚跑出去，就下起雨来。快半夜了，父亲才悄悄地回来，浑身上下滴嗒着水，冻的直打战战，连淋带吓从此就病倒了。一家人为了挣扎着活下去，母亲就把三岁的弟弟撇在家里，带我出去讨饭。

古历十一月的一天中午，北风卷着大雪，凄厉地吼叫着。我母子不能出去讨饭，一家人只得偎缩在屋里，清丝丝地饿着。忽然伪乡长领着几个伪军闖进我家里来，咬着他那被大烟熏黄的板齿牙，指着我父亲说：“姓赵的，看你再往哪里跑！”说着一把把我父亲从炕上拉下来，几个伪军立即给我父亲上了绑，拖了出去。母亲哭喊着赶出去，被一个伪军一脚踹倒在雪地上。不大会，有人给俺家送信来说，坏蛋们为了镇压全村人，今天就要拿我父亲作样子——枪毙。母亲听了，真象晴天霹靂，一边哭着，一边把炕上那床被子拿在手里，抱着弟弟，领着我，拼命地跑到伪村公所里去。进了“阎王殿”似的伪村公所的門，看见父亲全身的衣服都被扒去，高高的吊在一棵枣树上，只是略微还有点呻吟声。母亲一进门就跪在雪窝里，哭喊着求他们饶了我父亲的命。一个黄狗子从屋里跑出来，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上，母亲爬起来依然跪着哭求。那家伙又要打，这时一大群穷叔叔爷爷们走进来，都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在屋里的伪乡长看出势色来了，走出来说：“看在大家面上，饶了他的命。”而母亲抱的那床被子却被夺去了。

虽然我父亲当时没死在这些野兽手里，可是回到家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只是躺在床上呻吟。从那天起，就再也沒起来。我母亲是个屈死也不敢告状的人，只是淌眼泪，放悲声，两眼哭的象水铃铛一样，脸也肿起来了。父亲虽也是个受了一辈子冤屈的人，可是到了这步田地，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一天他把我叫到炕前，两眼含着泪水说：“孩子，我怕

是活不了啦，撇下你娘儿仨，你兄弟小，只有你懂事，你可要记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你千万跟着母亲领着弟弟活下去，记着今天……。”父亲眼看要死，母亲浑身浮肿，我白天得出去讨饭，三岁的弟弟简直象个孤儿一样，白天坐在屋簷下，有时睡在那里，冻醒了哭一会，满脸是冻疮，小手肿的象个紫茄子，本来是个会跑的孩子了，可是被折磨得连走也走不动了，只能在地上爬。

到了腊月二十七，这年是个“小尽”，离过年只有两天了。这时那些地主和伪村长正在欢天喜地地迎新年，我家却就要给父亲发丧。母亲浑身肿的不能行动了，对我说：“孩子，你爹反正不行啦，你去找个人把咱那二亩半地卖了去吧，不论给点什么东西就行。叫你爹死前吃上口东西，娘心里也好受点。”我听了母亲的话，出去找了一位姓陈的大爷，陈大爷也是个穷人，当天就把地给找着了主了，那二亩半地换回来三斤小米零几个窝窝头。当我把米拿回家时，父亲只是摇摇头，连嘴也张不开了。结果也没吃到嘴里一口东西。

除夕的下午，又是一场暴风雪。晚上天漆黑漆黑的，狂风飘着大雪，越发显得怕人。这时我父亲已奄奄一息了，有心到外边找个穷叔叔大爷来守着，可是正赶上这大年夜里，去找谁呢！

母亲坐在炕上低着头一声不响，弟弟扎在娘怀里睡了，我站在父亲的炕边上一动不动。油灯闪着豆粒大的光亮，消磨着这可怖的大年夜。

“孩子，你先躺会吧，反正你爹只剩下那一口气了，你看

着还管什么用呢！”母亲悲切地说。

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听了母亲的话，就往地下那堆草里一滚躺下了。

“孩子，把灯吹灭吧，一会再点。”母亲说。

我一口把灯吹灭了，屋子里漆黑一团，外面狂风呼啸，屋子里冷清清的，真使人可怕。我那能睡得着呢，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罢了。

过了一会，也许母亲认为我是睡着了，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呆望着那条条发白的窗樞，悲悲切切地祷告开了：“天神呀！地神呀！看看俺这孩子大人多可怜呀！你们显显灵验，给俺留下这条命吧！……”

母亲念念叨叨不住声，我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大一会，听着母亲在喊我：“孩子，起来吧，起来看看你爹，我怎么听不见他的一点动静了。”

我急忙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也不知是冷呀，还是害怕，浑身颤抖的拿不成个，急忙把灯点着，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用手揭开盖着父亲的那床烂被子一看，吓得我差点瘫在炕下。父亲的两颗眼睛动也不动，脸色煞白。我不由得把被子松开，“哇”的声哭出来了。

母亲急忙挪下炕来，到我身边说：“孩子，别哭，别哭……”可是她的眼泪却一把一把往下淌。

我听了母亲的话，停止了哭声。

母亲又揭开被子望着父亲：“他爹，他爹，你……”母亲连喊了两声。

不知怎的，父亲吐出了一口气，连着“呜呜”了两声，眼睛瞪的更大更大，望着我母子，想伸出手来，可是手已伸不出来了，嘴张了两张没说出话来，用尽最后的力气才从沙哑的嗓子里发出了微弱的话音：“他……他……他娘……儿呀……我……完啦，



丢下你母子无亲无友……可……别忘……”说到这里再也说不出来了。父亲的两颗眼睛瞪着，瞪着，始终没有闭上。

母亲一把抱住我，泣不成声地说：“孩子，娘实在走不出去，你去吧，去求求那穷叔叔大爷来给你爹穿衣裳吧！”这时我那能说害怕呀，擦着泪走了出去，刚一出去就被风雪扑倒，我挣扎起来又跑，又被扑倒，我又爬起来……就在这时，我听到财主家里传出爆竹的响声。

我的这段回忆完了。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以后你母子是怎样渡过来的呢？

我的回答只有两句话：

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我这一家人。

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抚养成人的。

我父亲死后的那年春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来到我们村上，就在我母子眼看要饿死的时候，政府救济了我家不少的粮款，把我娘儿仨救活了。我们这里解放了，穷人普遍翻了身，我们的生活更是一天天的好起来……。

现在我全家七口人，母亲虽已五十多岁了，可是身体依然很健壮。我爱人比我年轻，已生了三个小孩，大孩子已上学念书了。我弟弟已长成个青年小伙子了，现在在本村当教师，并担任着大队团支部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去年我们这里收成又不错，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这样幸福的日子，在二十年前我连想也没敢想过。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兄弟两个一定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工作！

忆苦思甜

临朐县城关公社 李本斌
东朱封大队队长

地主伪顽比狠狠 连杀我家几代人

俺家是啥时候穷的，谁也说不清了。俺老爷爷李兴代，在临朐北关地主油坊里扛了半辈子活，地主反倒说他欠了账，硬逼他把三闺女顶了债。最后，老人家死了个光腚。俺爷爷，二十来岁就被地主折磨死了。剩下了老奶奶、奶奶两个寡妇，拉着俺爹过日子。

俺爹李文襄，生就的硬腰板，浑身是力气。当时，亲邻近支，断根的断根，逃外的逃外，几股凑成了几亩薄地，由俺爹种着。俺爹想：凭自己的力气头，总能创出个业来。他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一把汗一把汗地在地里死拼。可是，在那旧社会里，哪有穷人的一条路呢？年年拼死拼活，全家老小还是落了个皮包骨头。

一九四一年，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交不上粮款，爹被地主、伪乡长李华斋打了顿耳光，还罚了三十天劳役。爹罚劳役没人挣饭吃，大秋天里，老奶奶咽着糠菜断了气。

转过年来，家景更惨了。一家人靠吃树皮、树叶过日子。有一次，买了一碗粮食，全家老小掺着树叶吃了五天。末了，

树皮、树叶也吃完了，就吃麦糠，吃蚕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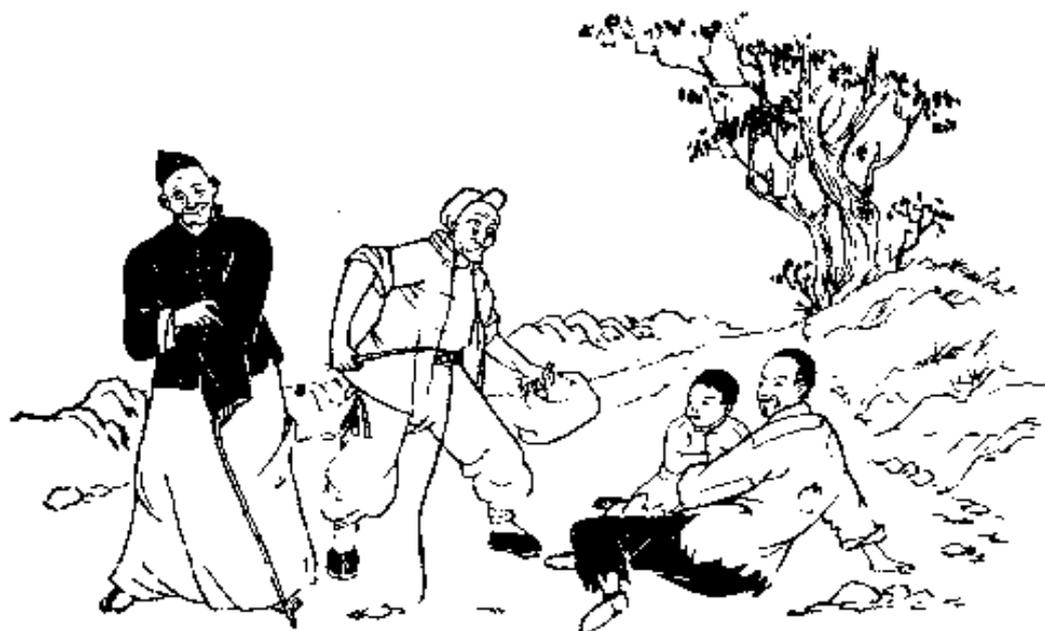
俺遭的是这样的穷罪，可是如狼似虎的伪保长和狗腿子，还整天上门催粮逼款。这帮出去，那帮进来，见啥就抢啥。连俺家仅有的一只水桶，也被抢走了，娘撞上去夺，被狗腿子一棍子打倒在地上。

交不上捐，俺爹被弄到了伪乡公所，乡长李华斋喝足了酒，醉醺醺地说：“穷小子，没有钱，拿命来，来人哪！”一群恶狼似的狗腿子围上来，接着就是一顿吊打。俺爹一声爹一声娘地惨叫，伪乡长李华斋在一旁，还一阵阵地笑呢！

俺爹挨了毒打回到家，抱着俺奶奶的头就大哭。奶奶哭着说：“孩子，别恋这个家啦，你大舅、二舅不是一个月的工夫都被逼死了吗？你快领着孩子逃命去吧！”爹哭着说：“我不能撇下你走，死，咱全家死在一块。”奶奶抹了把泪说：“你得给我走，咱李家总得留下条根啊……”这时，全家哭成了一团。

俺爹准备领我去逃命了，当夜写文书把三分后园地卖掉，好做个盘费。谁想到钱还没到手，就入了伪保长的腰包。他恶狠狠地对俺爹说：“钱全部顶上捐款，还净欠一百二十元，限你三天交清。”爹吞着气，一声没吭。以后，向亲戚家借了点钱，总算起脚走了。刚走了没一里路，又被伪保长截住，把钱全翻去，连作口粮的二斤花生饼也没给留下。爹把脚一跺，哭着领我走了！

一路上，俺爹象疯了一样，白天走着哭，晚上住下哭，眼哭成了铃铛，喉嚨哭成了紫瓦罐，到第三天晚上，走到临



淄县王庄的时候，他大罵了几声李华斋，接着就絕气了。这时，爹才三十二岁，他就这样活活被逼死了。

爹一死，奶奶連餓加悲痛，只一个多月，也死了。她老人家临死时，还张着嘴要口飯吃呢！

逃荒在外更难活 俺娘卖了亲骨肉

一家人，只剩下俺娘拉着四个孩子。怎么活啊！剜筐野菜混一頓，摘把桑椹頂一頓，挨門叫大娘，要几块煎餅翅，也算一頓。到了这个地步，伪保长还不舍气，天天逼着我去給汉奸出劳工，那时我才十三岁。娘一看，事不好，就領着我，抱着弟弟、妹妹，要着飯逃到了滨县。

在那里，俺娘們紧赶紧的串門，还要不了半个飽。有一次在集上，我弟弟福盛伸手向有錢人要口湯喝，就被打了一

頓耳光。我到赵家庄的一戶地主家要飯，地主喚出三只狗來咬我，我的腿上被咬了三個窟窿，鮮血直冒。地主還拿着斧頭攆我：“快滾，再不走，劈死你！”

冬天，我和弟弟、妹妹赤着腳，踏着雪，在外邊要飯。在一個風雪天里，俺們的腿腳都凍硬了，娘在野外找着俺，把腳放在她肚子上暖了一陣，才能走。

這怎么能活下去呢！娘萬般無奈，把二妹妹西華賣給了人家，可只換了二十一斤糧食！

後來，在外頭實在沒法混了，娘又領着俺兄妹三個回了家。哪是個家呀，院裡黃蒿半人深，屋裡空的連個掛燈檯也沒有，寡婦領着些光腚孩子，日子怎麼過呀，娘一腚蹲在門外，就哭起來了。我抹着眼淚，挎起那破籃子，才去要了點吃的。後來，亏了親戚家借給了把燎壺，用三塊半頭磚支起來燒點水喝。娘和俺，天天東討西要，忍飢受餓，過的還是非人的生活！

今日生活步步甜 跟着党走永不變

晴天霹靂一聲響，一九四五年来了共产党。这里解放了！穷爷們起来，斗倒了地主、伪乡长李华斋，穷人翻了身。我家和其他貧苦农民一样，先是政府多次發給救濟糧、救濟款、救濟衣，把全家从死亡的边上救出来；后是政府發給农具、肥料、种子，帮助重建家园；接着就領導組織农业生产互助組、合作社，发展生产，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一九五一年，我成了家，一九五二年，二弟本道上了师范学校，一九五四年，

大妹子桂娥上了高小，二妹子西华也找回来了，我們一家团圓了！

人民公社化以来，我們的日子更是越过越甜。新屋盖了三間，娘穿上了皮袄，家里还新买了自行車。穷人最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想想过去，我越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一九五八年，我和桂娥妹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被选为生产大队的队长，桂娥被选为妇女大队长。二妹子西华，高小毕业后入了团，当了生产大队的副队长。二弟本道，在外工作，成了先进工作者，也加入了共产党。

想想我这一家，要不是共产党领导鬧革命，早就进閻王殿了。这真是：狗地主害得我家破人亡；共产党领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张在湘整理

永 不 忘 本

——記解放軍空軍某部共產黨員王文江同志

會場，一片沉寂。聽眾的思想被一位頭髮花白、但身子骨還很結實的老人的報告，帶進了過去的人間地獄，又被帶回幸福的今天。

這位被譽為“老模範”、“活雷鋒”的老人，是解放軍空軍某部公務員、現年六十二歲的王文江同志。他，是時代的縮影。從他身上，人們看到了舊社會災難深重的勞動人民的命運，也看到了新中國勞動人民偉大的精神形象。

骨肉分離 家破人亡

一九〇一年六月，王文江出生在牟平縣酒館村的一個貧農家庭里。父親從小就給地主扛活，後來得了心口痛病，不能再下地，只好擺個小攤，給人補鞋納底，掙幾個錢；母親領着孩子耕種着全家唯一的二畝九分地，勉強糊住一家七口人的嘴。但是，到了一九一〇年，王文江九歲的時候，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臥床不起。為給父親治病，借地主的十多吊錢，駱打滾的利息，一年多工夫，就滾成了三十多吊錢。地主逼着要債，只好把一畝半地抵了給他。父親知道了，從床

上滚下来拉着母亲的手说：“孩他娘，以后千万别再给我治病了，留着这剩下的一亩四分地，好给你们娘儿生活。”说完，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因为卖了一亩半地，父亲急得病更重了。就在这年端午节那天早晨，母亲叫大儿子王文海领着小文江到地里去收回那几棵还没熟透的麦子，准备给全家做碗面汤喝，也算过个节。孩子刚出去，父亲就把母亲叫到床前对她说：“你去熬点雄黄酒来，今天过节，让孩子们也开开荤。”母亲以为父亲的心情好了，满心高兴地拿着小杯子上本家哥哥药店去了。可是，她哪知道，父亲让她出去是为了自己好寻短路。等她回来时，父亲已经用大孩子的腰带吊死在小草棚子的梁上。

全家大小哭成了一团。人死了，总得买口棺材；家里又背上了新的债务。父亲想以死来保留这一亩四分地，最后也卖掉了。这时，家里什么也没有了。生活一天也无法维持下去。两个姐姐早送给了人家，现在又狠心把哥哥送进烟台蚕丝厂当徒工去了。母亲带着文江和小妹妹文英，租了二大爷一亩多地，九岁的文江每天就跟着母亲下地劳动，成年野菜糠秫糊个半饱。

三年后，哥哥出师了，母亲指望他挣钱养家。可哪知哥哥到处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得离开家乡，奔东北去了。从此，不见人，不见钱，也不见信。母亲连气带累，身子也垮了，干不了活，家里连锅盖也揭不开。十二岁的王文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就去给地主放牛。白天奔劳一天，晚上与牲

口住在一起。有天晚上文江睡着了，忘了喂牲口，被地主毒打了一頓，还不給飯吃。小文江忍受不了，跑回了家。家里哪有吃的！走投无路，只好走哥哥的老路，十四岁就进了烟台益丰纈絲厂当童工。

资本家的心与地主一样黑。小文江还没进厂就立下了字据：打死勿論！病死勿論！被迫自杀勿論。进厂第七天，就跟老工人干一样多的活，干不完就得挨打。好容易熬过了三年，可这时老板又不要童工了。他只好又到东北中兴綢厂招工人的报名处，立了字据，打上手印，預支了十五块钱。年轻的王文江，哪知这十五块钱的轻重，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自己带着五块钱作盘费，把十块钱留给母亲。母亲看着钱就想起大儿子临走时也曾留下十块钱，不禁抱头大哭。王文江莫名其妙地问：“娘，有钱了，为啥还哭啊！”

母亲泣不成声，回答不出孩子的问题。她知道资本家的契约是不能反悔的，只好为儿子收拾行李，用丈夫吊死的那根腰带捆上一床破棉絮，塞上几个地瓜苗面饼，送儿子到渤海边上，哭倒在地。

文江走后，送给人家的二姐被活活饿死了。母亲气疯了，又没饭吃，不到半年工夫，就被拖死了。小妹妹被好心的本家叔叔抱了去。就这样，一家七口死的死，逃的逃，骨肉分离，家破人亡。

“宰牛鍋”和“閻王殿”

王文江和一群穷孩子来到了东北大孤山中兴綢厂。这个

厂有許多山东籍工人。他們看到老板又騙来这么多年輕弟兄，就摇头說：“小兄弟，你可来到了‘宰牛鍋’！”“宰牛鍋，啥意思？”王文江不明白地問。老工人叹口气說：“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完全明白。”

原来这个厂的資本家每天只給工人兩頓飯吃，还尽是倉庫底子糧，霉的都发了黑，吃到嘴里又酸又臭。而且每天只給一頓爛白菜、蘿卜条吃，常年不見油水。住的更坏，根本没有宿舍，到了夜里，就在繅絲架下摊开被子，躺在地上。地上堆滿了爛絲、死茧虫，又臭又腥，跳蚤滿地，随便在腿上摸一把，再撒开手，象炒米花一样乱蹦。吃不飽，睡不好，工作定額还很高。一天的活，十四五个小时还干不完，因此，工人常常“打通眼”，干到天明。就这样，还不許出一点点毛病，絲上有一点点小疙瘩就要罰，絲粗一点要罰，細一点也要罰，要是断了头罰得就更多。每月工資名义上是六块钱，七扣八扣，实际发到工人手里只有一块多錢，最多也沒超过两块五；有的干了一个月，月底还要倒找給資本家錢。王文江拼死拼活干了一年多，才还清了入厂前預支的那十五块钱。工人们悲苦万分，他們編着歌儿唱道：

二月里来龙抬头，
繅絲的工作好心愁；
四更起，三更休，
一天繅茧一千头；
吃不飽，睡不好，
繅絲的工人不如牛。

这时，王文江才懂得了什么是“宰牛鍋”。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心想：別处也許要比这里好些吧！于是，他收拾行李来到了安东，投奔义昌絲厂。义昌絲厂的工人听说他要来这里找好生活，都禁不住苦笑起来，告诉他：“我們这里不是工厂，是‘閻王殿’！老板是‘閻王爷’，管家的叫‘活剝皮’，有你好受的！”王文江一听凉了半截，好不容易逃出了“宰牛鍋”，又进了“閻王殿”。但是，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心想：总不会比“宰牛鍋”更坏吧！

誰知资本家一个比一个狠。王文江到厂里一看，住的、吃的都更坏。吃霉米，沒有菜，这都不用說，最狠的是资本家为了讓工人少吃飯，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吃剩的飯这頓掺下頓，今天的掺到明天吃。工人們端起碗来就想呕吐。王文江一怒之下，端着飯碗罵了起来：“他媽的，真是杀人不見血，这飯跟大粪一样，怎么吃呀！”这话被管家的“活剝皮”听到了，他搶过王文江的碗，把飯倒在地上喂了狗，然后凶狠狠地指着狗說：“狗都能吃，你就不能吃嗎？”

“我們是人，不是狗！”工人們被气得脸都发了白，異口同声地說。

“活剝皮”見大家都起来了，就把罪过都归咎于王文江，杀一警百，指着他的鼻子大喊：“是你煽动搗乱，我立即开除你！”

王文江当即被赶出了工厂。他一时感到走投无路，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再往哪里去呢？”“活剝皮”在后面听到了，神气十足地把手往东一指：“去你的元宝山！”



元宝山，許多人都知道，它現在已經成了劳动人民游覽避暑的风景区，可是，在那时，它是工人的葬身地。工人年老不能劳动的，有了病的，或者象王文江这样触犯了資本家的，被赶出工厂后，无处可投，就来到了元宝山，餓死、冻死、自杀在那里。可是年輕的王文江沒有去死。在工人兄弟的帮助下，湊了点盘費，奔向了西安（即今辽源）、哈尔滨……。十三年后流浪到了吉林市，碰到了从小离开的哥哥王文海。两人又悲又喜，抱头大哭。哥哥也是一无所有，連弟弟的住处都安插不了。王文江只好在一个穷朋友家里歇下了脚。

在日本强盜和国民党統治的岁月里

王文江到吉林市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

变。早已失业的王文江，孤苦伶仃，流落在吉林街头，出卖苦力。那时，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到处是卖苦力的。王文江几天难得找到一次活，卖不出劳力，没钱吃饭，常常只得到垃圾堆里去拣菜根、瓜皮填肚子；有时卖上了一次劳力，也只能买点“橡子面”充饥。橡子面是柞树子、树叶、糠，加上少许谷子磨成的，吃了鼻子流血，全身发肿。刚过三十岁的王文江就被折磨得不象人样，走起路来摇晃不定。

在日寇统治下的东北人民，除一些大资本家、大地主以外，一般庶民是不能吃大米的，吃了就是“经济犯”，要犯死罪。有一天，王文江看着鬼子兵开着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轧死了一个男孩，肚子轧破了，血肉横飞。鬼子发现肠子里有大米粒，就把小孩的父母抓起来审问，灌辣椒水，上火刑，活活地被打死了。

日本强盗的末日总算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强盗无条件投降了。人民认为这下该过太平日子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把人民重新推进了火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到处修建碉堡、战壕，王文江又被牵着鼻子，拖着多病的身子，日夜服劳役。

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

一九四八年春，吉林市解放了！受了四十多年折磨的王文江高兴得彻夜没眠，又洗衣又理发，换上干净的衣衫，去参加市里的庆祝会。之后，他淌着感激的热泪搬进了政府帮助他兄弟俩盖的四间小房。起初分配他当建筑工人，不久分

配他当了行商第一組組長，監督資本家偷稅漏稅、投機倒把等不法行為，在“三反”、“五反”中，他被評為與資產階級鬥爭最堅決的積極分子，被選為街道的民政組長。後來結了婚，成了家，這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所有這些，使王文江情不自禁地喊道：“共產黨呀，毛主席，您可真是俺窮人的恩人啊！”

一九五〇年秋，美帝國主義在朝鮮點起了戰火。美帝國主義的罪行，激起了王文江無比的憤怒，他想起當年日寇侵略中國的慘狀，連飯都吃不下了，報名要求上前綫。政府把他介紹到部隊，分配他到空軍某部負責機關的清潔衛生工作。他高興地說：“我年紀大了，不能拿槍上戰場，能為部隊干點工作，也盡到了保衛祖國的一分責任啊！”

在部隊里，王文江受到黨的教育和同志們的幫助，階級覺悟大大提高，爭取做一個共產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成了王文江同志的偉大理想。為了學習《毛澤東選集》，懂得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開始同一些青年戰士一起學習文化。晚上，他戴上老花眼鏡讀到深夜。不認識的字，不理解的句子，就圈起來，第二天再問別人。他周圍的同志，上至首長，下至飛行員、炊事員，都是他的教員。現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都讀了一遍，其中有的文章，已經讀過好幾遍了，還寫了學習筆記，並且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個時期他負責辦公室的勤雜工作，沒有暖水壺，無論天冷天熱，他都是提着一把鐵壺，到每個辦公室去給同志們一碗碗地倒開水。飛行員夏天換衣服多，一個星期要換好

几次，来回送衣服耽误不少时间。他想：如果能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去练硬功，技术该有多大提高啊！想到这里，他毅然把自己分外的工作承担起来，早上把衣服收起来送到洗衣房，晚上又拿回来分送到各人的床上。有次部队增加了九个飞行员，他们工作很忙，没人照顾，他又主动把责任担当起来，扫地、打水，还帮助叠被、洗床单和枕巾，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王文江左身关节痛，组织上送他到军人招待所里休息，可他闲不住，总是干这干那的。当他发现夜里来的家属、客人常常找不到地方时，他就主动搬到营门边的仓库去住，每晚都要等到最后一班車过了才熄灯去睡。

王文江成了部队的学习榜样。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在他五十七岁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毛主席的肖像前面，高高地举起左手宣誓：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永远不忘过去

王文江同志时刻记住过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工作中，王文江同志总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精打细算。一个牙膏皮，一个铁钉，一根布条，一张废纸，在他眼里都是宝，都要一点点地拾起来，然后分类排用场。布条留着自己扎地板擦，自己清扫用不了，还送了不少给人家。铁钉用来修理板凳门窗，他自己有一套小工具，常常这里打打，那里敲敲，不知有多少破了的用具在他手里又完整了。牙膏皮、废纸、果皮卖给废品商店，有时卖

个三角五角，有时卖个五元六元，上元的錢交給俱樂部作文娛樂費，几角的就买上針綫，立个小修补摊，給同志們补个袜子，釘个扣子；有时买几盒火柴，放到會議室里；有时买几瓶浆糊，給飛行員貼图表。有一次部队轉場了，他在后方留守，他又拣废品卖了十二塊錢，他把錢存到銀行，同时給領導上写了一封信，准备部队回来后交公。首长回信說，这笔錢就作为給他的奖金，叫他不要上交了。但他想：我吃的人民的飯，拣的人民的東西，这个錢我怎能塞自己的腰包！部队回来后，公家不收，他就把它买成暖水瓶和洗刷用具，放到會議室和办公室里使用。

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前夕，部队展开了国庆献礼活动。同志們都各有自己的“宝”，王文江同志經過精心計劃，也献出了自己的礼物。礼单上写道：“十年国庆来到啦，我給国家献个啥？废纸收拾五十斤，废瓶拣了五十八，破烂鋼鉄十八斤，还扎两个地板擦。休笑我的礼物輕，千斤情意上面挂！”首长和同志們看了王文江的礼物，都一致贊揚他：献出了我們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前两年王文江同志回东北吉林市探家。虽然，他自己沒有留下后代，但是，他現在的家庭却是个十分幸福的家庭。哥哥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解放軍战士，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学生。晚上，王文江給孩子們講起了过去，他說：“你們要想一想：过去我和你爸爸一家是七口，現在你們是十口，为啥我們那时成天劳动吃不飽肚子，最后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現在你們为啥不愁吃不愁

穿，幸福无窮？過去我們是工人，現在你們當中也有工人，為啥過去我們沒有文化，成天象牛馬一樣，資本家說打就打，說罵就罵，現在你們都能上中學、大學念書，這個福利，那個補助，……過去我們在地獄，現在你們在天堂！可你們要記住：這幸福是黨和毛主席領導得來的，是無數先烈犧牲流血得來的。你們千萬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不能忘記過去祖祖輩輩的苦難日子啊……”

說到這裡，王文江說不下去了。孩子們都是在黨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已經開始懂得了階級苦，知道了自己的階級地位，都紛紛表示：要記住叔叔的話，永不忘本！

何光先

四十年牛馬十年人

山东省杂技团副团长 李鳳英

我是个杂技演員，自九岁起从事杂技表演，到現在整整五十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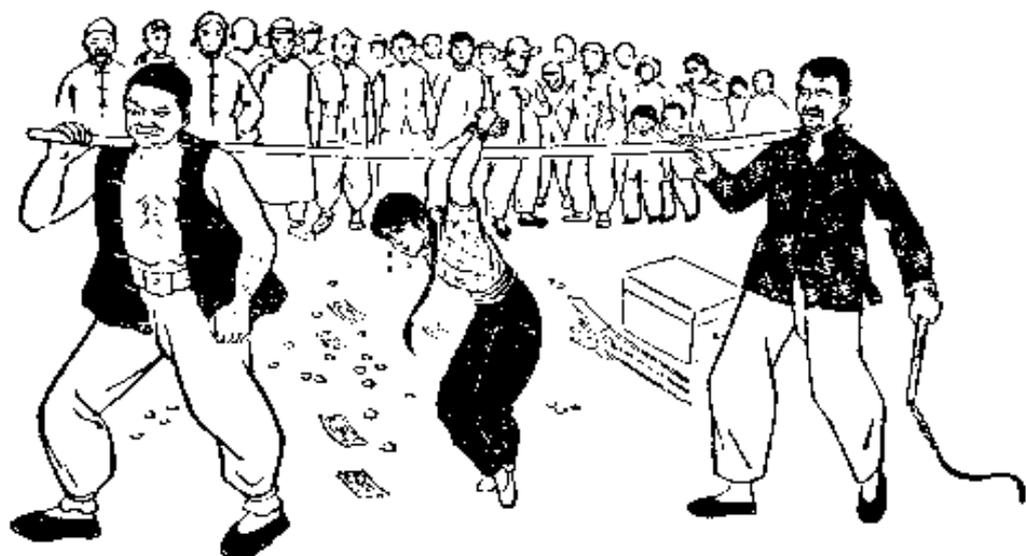
这五十年，是从牛馬到新人的五十年。

我出生在济宁小王庄，父亲給地主扛了一輩子活，到老也沒有掙下一間房子半分地。母亲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忍着骨肉难离的痛苦，哭哭啼啼地把我卖给一个外号叫李半仙的馬戏班老板。从此，我便作了李老板侄子的童养媳，那年我才八岁。

李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瞎老头子。他肥头肥脑，长一脸横肉，对待艺人又凶狠又毒辣，一不順心就罵人打人。他有一个大女儿，自称李大姑。她油嘴滑舌，奸詐阴險，整天給瞎老板出主意，实际上她是馬戏班的女老板。另外还有一个叫段法昌的狗腿子，这只狗在主子面前摇头摆尾，唯命是从，在艺人面前狐假虎威，十分厉害。他与李大姑勾勾搭搭，日夜鬼混，他們俩是瞎老板的“哼哈”二将，合伙对付艺人。我一看到这伙人就吓得战战兢兢，象住在狼窝里一样，每天提心吊胆地伺候这个，侍奉那个，送茶递烟，烧火作飯，端屎端尿带孩子。尽管拼命地干活，白天黑夜累得要死，还是

脫不了老板的毒打。挨打，不是因为干不好活，而是老板賠了錢拿我出气，赚了錢又拿我开心。出气的时候用鞭子抽，鉄棍打；开心的时候用針錐子刺我的全身，不但不許我哭，反而硬叫我笑。

老板为了多賺錢，还拿我作生財之道。每当演完一場，便把我的两只胳膊倒綁起来，再用一条扁担插在我的两臂之間，抬起来繞場子轉，借以向观众要賞錢。痛的我裂嘴咬牙，泪流滿面，直到观众扔进錢来掩目而退后，才把我松綁。



可是，这样并不能使老板滿足，他們要从我的身上榨出更多的錢来，老板叫我每天起五更練节目。那时候練节目可不象現在，既沒有練功服、排練室和保护設備，也沒有教員耐心指导，所有的无非是皮鞭、木棒、鉄条和坟坑。如果跌伤不能上場了，那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活命，我有伤不敢

說，有病不敢講，一連鬧了三年的痢疾无一个人管。我忍受着一切折磨，上刀山、爬高杆、蹬坛子、学馬术、翻跟斗、打秋千。所謂“打秋千”，是老板把我的辮子拴在繩子上吊起来在高空游蕩。有一次，繩子沒有拴紧，我一下子从空中摔下来，老板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看我还有一口气，指着高杆子大声叫道：“重来！”我昏昏迷迷的听成了“活埋！”吓得爬起来，不管胳膊、手脚摔断了沒有，忍着剧疼又上了“秋千”。

我就是这样練各种杂技节目，跟着馬戏班子走南闖北，奔波江湖。有些青年演員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折磨，大部逃走了，所以，更多的演出場次和节目落在我的身上。究竟老板从我身上賺了多少錢？我不知道，只知道自从我当了馬戏班的主演以后，李半仙除了吃喝嫖賭以外，还买了四十亩地。

我十九岁的时候，便演紅了。观众們送給我一个艺名，叫“盖山东”。从那以后，瞎老板也挤弄着瞎眼对我笑了，不过，黄鼠狼子給鸡拜年——沒安好心，他們想把我当作一棵“搖錢树”牢牢地拴在他們手中。接着，瞎老板的侄子得病死了，瞎老板叫我再嫁給他的儿子。他儿子才十二岁，人不大却已經有了两房妻子。我不干，老板們便使用了更毒的手段。

这一天，老板摆上酒席，請来了亲戚朋友和吹鼓手。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刚想出屋望望，突然，瞎老板、李大姑、段法昌这伙人闖到我屋里来。段法昌提着鋤刀象劊子手一样堵住門口，李大姑聳着肩膀尖声尖气地說：“我来成全你的

好事，走吧，出去跟我兄弟拜堂成亲！”我气得全身发抖，说不出话。瞎老板叫道：“你要拜堂就百事大吉，你要说个不字，就把你铡了！”说着，那段法昌凶神似地举起铡刀来，不等我喘一口气，进来两个人把我拖出去，拌着我的脖子按在地上与瞎老板的儿子拜了天地。我哭成了个泪人，吹鼓手却吹打起来。

哭干了眼泪，气断了心肠，我想一头撞在墙上自杀，但又想肚子的气出不来，不能这么白白的死了，要活下去。可是在这群狼心狗肺的野兽面前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早早晚晚还不是被折磨死？干脆逃出这个狼窝，宁肯要饭讨生，天涯淪落，也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数九寒天，快过年了，这天黑夜，我终于逃了出来。可是哪里是条出路啊！往哪里逃，往哪里奔呢？逃回老家去吗？不行！一来，老板会派人去搜查，二来，母亲也死了，哪儿还有家呀！于是，我不管悬崖深沟，一股劲地往前闯。跑到济南北，突然一条大河拦在眼前，我急得直跺脚，在河边上转来转去。过河吧，不知冰有多厚，水有多深？不过河吧，又怕老板派人追上来，再落到他们手里就没命了。最后下了决心：往前闯！就算沉河死了也甘心。我向冰河里走去，正走着，“卡叭”一声响，就掉进水里去了。

幸亏水不深，我拼命地往上爬，好容易爬上来，没走几步又掉下去了。等我第二次爬上来，不敢再站起来走，便连滚带爬地过了冰河。

刺骨的寒风刮着，我打着冷战，上牙下牙碰得卡卡直响。

天漸漸明了，我強打着精神，鼓了鼓氣，一跛一拐地又走了一里多路。在一個村頭上，碰上一個起早抬糞的老大爺。我跪下給老大爺磕了個頭，說：“老人家，快救救我吧！”老大爺看到我那個狼狽樣子，吃了一驚，急忙問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把我的身世和怎樣跑出來的事告訴了他。老大爺聽明白了，便領我到了他家。老大爺給我換上衣服，帶上干糧，女扮男裝，買了一張到北京的車票。臨上車時老人家對我說：“孩子，天下老鴉一般黑，往後你還要多加小心！”我感激得說不出話，抱着老大爺哭了一場。

到了北京，我住在一家小客棧里，可是手中分文沒有，為了交房租和吃頓飯，我到天橋結識了江湖同路人。這事被天橋的一個姓喬的馬戲班老板知道了，他把我找了去，想從我身上發點財。我恨透了老板這一行人，可是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演幾場。當時正是軍閥混戰，人慌馬亂的年月，我一個孤身軟弱的女人隨時都有遭到不幸的危險，況且瞎老板還貼出告示，揚言：“有知‘蓋山東’下落者，告于本班，賞銀元五十塊。”我又趕快離開北京，這裡躲躲，那裡藏藏，象個“黑人”似地各處流浪。一九二七年間，我先後到了恩縣、平原一帶的農村，我以為來到農村就平安了。誰知道，那瞎老板雖然沒眼睛，可是他是一個勾通官府的吃江湖飯的家伙，耳朵長，消息靈，知道了我的下落。有一天，我正在平原趙家庄住着，段法昌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他冷笑一聲，不容分說從腰里抽出鞭子打了一陣，用繩子把我捆綁起來。真是“閉門屋裡坐，禍從天上来”。我象作惡夢一樣，被段法昌拖進了平原城。

到了城里，我又见到了瞎老板和李大姑。我知道这一次他们不会轻饶我，豁上这条命给他们拼了吧！我刚想扑上去，过来两个衙役给我带上手铐，把我押起来了。

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在过堂的时候，县太爷不等我诉说，一拍案子，骂我是“泼妇刁民”，叫衙役压我的杠子。压完了杠子就逼我回李家。李大姑不同意，要县太爷允许二百块现大洋把我卖给跟班的段法昌，让他管教我。这样，我又成了段法昌的奴隶。

后来，我才知道，这场官司是李大姑一手安排的。她知道我不会甘心跟她回马戏班，就算拖回去我也不会甘心再给他们演出挣钱。可是她们又舍不得我这棵“摇钱树”，段法昌能打着我上刀山、爬高杆，赚了钱也有她李大姑一份，所以她二百块大洋把我卖给了段法昌，一百块归她家，那一百块早就送给县太爷了。

段法昌买了我以后，他自己单独成立一个马戏班。这条狗腿子一当上老板，比那瞎老板更厉害，他吃喝嫖赌，勾结官府，欺压艺人。名义上我是他的偏房老婆，实际上猪狗不如。我每天给他演出挣钱，他连饭也不给我吃，叫我到街头上“散筷子”要饭吃，要了白馍馍还得交给他。就这样还常常打得我死去活来。我出了火坑又陷进苦海。实在没活路了，我上过吊、跳过井、吞过大烟、喝过火油，四次自杀都被同伴们救活了。

我的少年、青年、壮年时代就这样在血与泪、死与活的挣扎中过去了。解放后，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搭救出

来，成了党的文艺工作者，担任了山东省杂技团的副团长，又当上了省政协委员。最近两年，党组织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健康，让我作教学工作。这一切，怎么不使我感激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呢！我常常想，要不是党，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丢在哪个山沟里。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身在幸福中，我又常常感到惭愧，总觉着为党工作的太少了。我虽然在上山下乡为工农兵服务中作了点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是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太远。我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仅要报答党的恩情，感谢党的教导，更重要地要以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培养祖国杂技艺术的接班人贡献出毕生精力。

阎丰乐整理